

中国古人类学三十年 (1949—1979)

吴汝康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

中国是人类起源和发展的重要地区，有着极为丰富的人类化石和旧石器等有关材料。可是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这门科学得不到重视和发展。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的古人类学走上了独立自主的道路。三十年来，我们进行了规模较大的调查工作，并选择重点进行了发掘，获得了大量的新材料，进行了各方面的研究。

现在把我们取得的成果，根据时期先后的顺序，作以下的介绍。

一、古猿和早期人科化石

1. 森林古猿和腊玛古猿

1956年二月地质工作者在云南开远小龙潭村，由第三纪煤系中发现了五个牙齿，是属于森林古猿的，这五个牙齿是左右下第二前臼齿的破碎齿冠、左右下第二臼齿和右下第三臼齿的完整齿冠，是属于同一个下颌的，牙齿和形态性状与印巴次大陆西瓦立克层发现的旁遮普森林古猿很相似，但又有某些不同之点，因而定名为开远森林古猿。这是森林古猿化石在我国的首次发现。

1957年秋，云南省博物馆又寄来五个牙齿，也是在小龙潭煤田中发现的，牙齿是右侧下颌的 P_3-M_3 ，其形态特征基本上与前次发现的相一致，因而归入同一个种。但这批牙齿远比前次的为大，可能是属于雄性个体，而前次的则是雌性，近年来有人认为后一批牙齿可能是属于腊玛古猿类。它们的地质时代根据地层层位和共生的哺乳动物，定为中新世晚期。

1976年在云南禄丰石灰坝煤场，发现了一些古猿的上、下颌骨和四十多个单独的牙齿，根据动物化石，其时代定为第三纪上新世早期，其中有一具完整的下颌骨，保存了除内侧门齿以外的全部牙齿，其形态与腊玛古猿类相似，定为腊玛古猿禄丰种，此项工作仍在继续进行中。

2. 巨猿

巨猿最早是孔尼华于1935年命名的。但长期以来，对巨猿的系统地位、地质年代和确切的化石产地都不很清楚。

1956年初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大新县榄墟牛睡山黑洞中发现了三个巨猿牙齿和大量哺乳动物化石。同年秋，广西柳城农民在楞寨山的山洞内发现了一个巨猿下颌骨，交我们研究所进行研究。此后，我们对这个洞进行了多年的发掘，又发现了两个下颌骨和一千多个牙齿以及大量哺乳动物化石。根据这些材料的研究，确定柳城巨猿的地质时代为更新世早期。

另外，在广西和广东也陆续发现了巨猿牙齿 47 个，但确实的产地不明。

1965 年在广西武鸣一个山洞中发现了 12 个巨猿牙齿。1968 年和 1970 年在湖北建始发现了新的巨猿化石地点和 250 多个巨猿牙齿和大量伴生的哺乳动物化石，研究结果表明其时代比柳城巨猿为晚，可能为早更新世晚期。1973 年在广西巴马县又找到一个巨猿牙齿，大新、武鸣、巴马发现的巨猿化石的地质时代可能都是更新世中期。

国外发现的巨猿标本是 1967 年在印度发现的一个下颌骨，地质时代是第三纪上新世中期。最近，据报告在巴基斯坦也发现有巨猿标本。

迄今所知的巨猿材料仅限于下颌骨和牙齿。它的分类位置至今仍有争论。有人认为它是人科系统上早期分出的一个旁枝，也有人说它是猿类的一种特殊类型。可以肯定的是，巨猿是一个灭绝的旁枝，因而不可能是人类或猿类的直系祖先。魏敦瑞认为巨猿是巨人，并从而提出人类的巨人起源说。现有的一切人类化石表明，这是没有根据的。现在已知道，巨猿生存的时期从第三纪上新世经更新世早期到更新世中期，分布的地区从亚洲南部的印巴次大陆到我国南方的广西和湖北一带。巨猿的身材也随着时间而逐渐增大以至最后绝灭。这些研究有助于我们对人类起源问题的理解。

此外，还有在湖北建始发现的早更新世晚期的几个牙齿，认为可能是类似南方古猿的类型。

二、旧石器时代早期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新发现的猿人化石地点有云南元谋和陕西蓝田公王岭和陈家窝。在周口店的第一地点也有新的材料发现。在湖北郧县、郧西县和河南南召县也发现了猿人牙齿化石。贵州的观音洞是只有石器而无猿人化石的主要洞穴地点。在湖北大冶、辽宁营口等地也有这类发现。

1. 元谋猿人及其文化

元谋猿人化石是 1965 年 5 月在云南大那乌村附近发现的，材料有左右上内侧门齿各一个，其形态和北京猿人的很相似，地质时代可能为早更新世晚期。最近用古地磁法测定，其绝对年代约为距今 170 万年前。1973 年冬发掘元谋猿人地点时，在产猿人化石的同一套地层中，又发现了三件人工打制的刮削器，中等大小，原料是石英岩。

2. 蓝田猿人及其文化

1963 年在陕西蓝田泄湖公社陈家窝村红色土地层中发现一个“直立人”类型的下颌骨，1964 年在蓝田县城东约十五公里的公王岭红色土堆积中又发现猿人的头盖骨和部分面骨。蓝田标本在形态上比北京猿人和爪哇垂尼尔头骨为原始，而大致与最早的爪哇粗健猿人相近。其地质时代早于北京猿人，可能是中更新世早期。

蓝田猿人的文化遗物不多，石器大部分是用石英岩和脉石英打制的，具有较多的原始性，第二步加工的较少而且比较粗糙，形制也不很规整。代表性的石器是厚重尖状器，也发现于山西匼河和丁村遗址中，似乎表明蓝田猿人文化同匼河文化和丁村文化之间有较为密切的关系。

3. 北京猿人新材料及其文化

周口店第一地点在新中国成立后进行了发掘，1949 年和 1951 年发现五个猿人牙齿

和两段肢骨，其中胫骨化石是在周口店首次发现的新材料。1958年，发现了一个相当完整的女性的下颌骨。1966年发现了一个头盖骨的额骨和枕骨部分，与1934年发现的两块头骨破片拼合成一个相当完整的头盖骨。另外还有单独的一颗牙齿。在第一地点也发现了大量旧石器，用火的遗迹和多种哺乳动物化石。北京猿人的肢骨与现代人的差别较小，而头骨则带有许多明显的原始性质。因而国外有人认为周口店同时存在着两种人，一种是以肢骨和物质文化（石器和用火遗迹）为代表的进步的人，另一种是以头骨为代表的原始的人，头骨是进步人类猎取来取食脑子后留下来的。

1949年中国解放以后，我们根据劳动创造人类的理论，提出了新的解释，认为猿人的体质形态显示人体各部分发展的不平衡性，在人类进化过程中，首先是两足直立行走姿势的确立，手从支持作用中解放出来，制造和使用工具进行生产劳动，人脑是在直立行走确立之后，在长期的生产劳动的实践中发展起来的。恩格斯说：“在某种意义上不得不说，劳动创造了人本身。”猿人化石的研究，为恩格斯的劳动创造人类的理论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石器是北京猿人用来同大自然作斗争的重要工具。他们已懂得对不同的石料采用不同的加工方法，主要有锤击法、碰砧法和砸击法。石器已有多种类型，主要有砍砸器、刮削器和尖状器等几大类。

火是北京猿人用来同大自然作斗争的另一种手段。从遗址中发现的木炭、灰烬，燃烧过的土块、石块、骨头和朴树籽等表明他们已经知道用火，并且有了长期用火的经验。

与北京猿人伴生的哺乳动物中有犀牛和象，表示当时周口店一带的气候比现在温暖。他们周围的自然环境也比较复杂，例如有适于水栖或水边生活的大河狸、水獭、水龟、水牛化石等，表明在周口店附近有较大的沼泽和河流，有许多猕猴、虎、豹和斑鹿等，表明附近有森林和山地，有马化石等，表明在不远的地方有草原；有骆驼和鸵鸟化石，表明甚至在不太远处有沙漠，这些不同的地貌类型可能同时存在于周口店的四周，但它们更可能分别代表着不同时期的环境，猿人遗址中孢子花粉的研究，也表明在北京猿人生活的漫长时期中的气候，曾经历过冷暖的变迁。

近来在湖北郧县梅铺、郧西县白龙洞的岩洞和河南南召，也分别发现了猿人的几颗牙齿化石。

4. 观音洞文化

观音洞在贵州省黔西县，观音洞文化发现于1964年，到1972年冬，先后发掘过三次。发现石器、石片和石核共两千多件，主要是用燧石或硅质灰岩打制成的。石器的主要类型有砍砸器、刮削器、端刮器和尖状器等。许多石器和北京猿人遗址上部地层中的有些相似。但又有它自身的特点。观音洞是解放后我国南方发现的旧石器时代早期最大的洞穴遗址。伴生的动物化石有乳齿象、东方剑齿象、大熊猫、巨貘等二十种，地质时代是中更新世。

5. 盂河文化

山西芮城的匼河文化发现于1959年，1960年作了调查发掘，在十一个地点发现了石器和动物化石。石片、石核、石器共138件，以石片石器为主，打制技术不如北京猿人，对生产石片的石核的利用率也较低，石器的修整也不如北京猿人精细，总的来说，匼河石器比北京猿人的较为原始。

从打击石片的方法以及都有三棱大尖状器和石球，表明匼河文化与丁村文化有较密

切的关系。伴生的哺乳动物化石有肿骨鹿、扁角鹿、水牛、剑齿象等十三种，地质时代为中更新世。

6. 其他

1971—72年在湖北大冶县石龙头洞穴中发现一批旧石器和哺乳动物化石。主要的石器是用石英岩打制的砍砸器，它的手握的部分，也象北京猿人的有些石器那样经过了修理。

1974年，在辽宁营口金牛山的山洞和裂隙中，发现了大量的哺乳动物化石、少量的石英做的石器，石器以单面修理为主，主要类型是刮削器，与北京猿人刮削器十分相似。从而反映出两者文化上的密切关系。据报道，依已发现的哺乳动物化石资料，时代与北京猿人地点顶部堆积相当。

此外，在山西、河南、陕西也还发现一些旧石器时代早期的地点。

这里还应该提起，在河北泥河湾发现的原先被认为是早更新世的一块石器，近来经过复查，表明该地层的时代是晚更新世，又过去在山西芮城县西侯度更新世地层中发现的旧石器曾被认为是早更新世的，目前仍有不同意见，需要进一步进行工作。

三、旧石器时代中期

解放后旧石器时代中期的发现主要有大荔人、马坝人、长阳人、丁村人及其文化和鸽子洞文化。

1. 大荔人

大荔人是1978年在陕西省大荔县段家公社发现的，材料包括一具相当完整的人头骨化石，十余种动物化石和180多件石制品。

大荔人化石及其伴生的哺乳动物化石、文化遗物，产自洛河第III阶地下部，其时代为中更新世晚期。

这个人头骨是我国迄今发现的直立人和智人之间最完整的化石，其形态介于两者之间。

动物化石中有肿骨鹿、鹿、古菱齿象、马、犀牛、鸵鸟等。

文化遗物以石制品为代表。石器类型单调，均为刮削器，器型较小。

2. 马坝人

马坝人化石是在广东曲江县马坝狮子山发现的一个头盖骨。这个发现不仅扩大了中国远古人类的分布范围，而且填补了我国人类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马坝人头盖骨可能是一个中年男人的，眉脊粗壮而明显突出，在眉脊后方的额骨部分明显缩窄，类似猿人。头骨厚度不及猿人，与尼人相近。眼眶上缘呈圆弧形，也与尼人相似。头骨高度和额倾斜度也在尼人的范围内。另外与西欧的典型尼人也有明显的不同。

与头骨化石伴生的动物化石都是华南更新世洞穴堆积中常见的大熊猫——剑齿象动物群的一些种类，表明当时的气候潮湿而温暖。

3. 长阳人

长阳人化石是在湖北长阳下钟家湾村附近的一个岩洞中发现的，这个化石标本是一块左侧上颌骨断片连同两个牙齿。前部不大向前突出，腭面凹凸不平，与现代人相似，但

也有一些可能是比较原始的性状，如犬齿隆凸显著，鼻腔底较为平坦等。

伴生的动物中有中国鬣狗等，其地质时代可能为更新世中期之末或晚期之初。

4. 丁村人及其文化

丁村遗址是1954年在山西襄汾丁村附近发现的，材料包括三个人牙化石，大量旧石器和哺乳动物化石。三个人牙是上内侧门齿，上外侧门齿和下第二臼齿，全是右侧的，同属于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孩，其形态性状介于猿人和现代人之间。伴生的动物有梅氏犀、印度象、水牛、鬣狗和鸵鸟等喜暖的种类，表明当时汾河一带的气候比今天温暖而湿润。大致相当于现在的华南地区。1976年在丁村又发现了一块大约两岁幼儿的右顶骨的后上部。

丁村人与北京猿人和现代黄种人在体质形态上都有不少相似之处，如有铲形的门齿，从顶骨后上角有带锯齿的缺刻来看，可能有顶枕间骨，这些都表示他们之间有亲缘关系，丁村人是介于北京猿人与现代黄种人之间的一个中间环节。

制作旧石器的原料是坚硬的角页岩，石器的主要类型有厚尖状器、砍砸器、刮削器和石球等。这些石器的类型都较为规整固定，丁村石器的多样性表明丁村石器的用途已有明显的专业分工。

丁村文化和北京猿人文化有相似之处，例如都以石片石器为主，单面加工的石器占多数，有些石器的类型相同等等。但是丁村文化也有其自身的特点。比较起来，可以看到丁村文化和蓝田猿人文化、匼河文化有着较为密切的关系。

5. 鸽子洞位于辽宁省喀左县，1973年在这个洞里发现了一批旧石器、用火遗迹和大量的哺乳动物化石，石器的制作技术、打片方法、石器的大小和类型都与周口店第一和第十五地点相近，是北京猿人文化的继续和发展，是北京猿人文化向北发展的新资料。依据1975年再次发掘的资料，其时代大体上与丁村文化期相当。

6. 许家窑人及其文化

许家窑遗址位于山西阳高县古城公社许家窑村东南1公里处梨园沟的断崖上，经过1976、1977年两次大规模的发掘，获得大量脊椎动物化石、石器、骨器和人类化石。地质时代为晚更新世底部。

人类化石有较完整的顶骨三块、枕骨两块，左上颌骨一块（附连部分牙齿）和一些零星的顶骨破片和牙齿，分别属于十多个个体。头骨壁很厚，顶骨曲度介于北京猿人和现代人之间。牙齿粗大。

石器有刮削器、尖状器、雕刻器、石钻、砍砸器和大量的石球和石核，属旧石器时代中期。

此外，1971年在贵州桐梓还发现了可能是更新世中期或晚期的两个人牙化石和同观音洞文化相似的一些石器和大量哺乳动物化石。

四、旧石器时代晚期

解放以来在中国发现了旧石器时代晚期的许多晚期智人化石，主要有柳江人、资阳人等，河套人增加了新的化石材料，对山顶洞人根据模型重新进行了研究。解放后发现的旧石器时代晚期含有文化遗物而没有人类化石的地点更多，在辽宁、内蒙古、宁夏、甘肃、陕西、

山西、河南、山东、湖南、江西、广西、云南、四川等都有发现，特别是在西藏定日县也发现了旧石器。其中比较重要的有山西的峙峪、河南的小南海和四川的富林等遗址。对过去发现的宁夏水洞沟遗址也进行了重新研究和发掘。

1. 柳江人

柳江人化石是 1958 年在广西柳江县新兴农场通天岩的岩洞中发现的，化石材料包括一个完整的头骨（缺下颌）、两段股骨和一右髋骨、骶骨、椎骨，属于一个中年男人，股骨可能属于另一女人。

这个头骨具有黄种人的许多特征，如颜面上部、鼻梁和嘴部向前突出的程度与现代黄种人相一致，硬腭中等大小和门齿呈铲形等。年龄在 40 岁以上，没有发现文化遗物。动物化石属我国华南山洞中常见的大熊猫——剑齿象动物群，表明当时的气候是温暖湿润的。

2. 资阳人

资阳人化石是 1951 年修建成渝铁路时在四川资阳的黄鳝溪大桥桥墩工程中发现的一个老年妇人的头骨。头骨的颅顶部分保存完整，颅底大部缺失，另外还有硬腭一块。同时还发现一个骨锥。

头骨比较小，但仍在现代中国人的变异范围内，有一些原始性状，如眉弓较发达，枕骨内面的大脑窝比小脑窝深而且广等。与资阳人共存的动物化石有猛犸象、鹿等。有人认为它的时代较晚，但目前还无定论，这里仍把它作为新人化石之一。

3. 山顶洞人的重新研究

山顶洞人化石是 1933 年在北京周口店龙骨山顶的另一个小山洞中发现的，包括三个相当完整的头骨，一男两女，加上其他零星骨头，至少代表八个个体，同时发现有骨器和少量石器。

1939 年魏敦瑞研究山顶洞人头骨后，认为男的老人接近日本北海道的虾夷人，中年女人是似爱斯基摩人，青年女人似美拉尼西亚人。

1960 年经我国人类学工作者重新研究，认为山顶洞人代表原始的黄种人，而与中国人大、爱斯基摩人和美洲印第安人特别接近。

4. 河套人的新材料

1922 年在内蒙古自治区乌审旗的大沟湾发现过大量动物化石，其中有一颗小孩的上外侧门齿，代表所谓“河套人”。1956 年内蒙古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又在乌审旗噶哈沟湾村附近发现了人类的左股骨的下半段和一块右顶骨破片。增加了对河套人形态的了解。

5. 水洞沟遗址

宁夏回族自治区灵武县的水洞沟遗址，是最早发掘的遗址之一。解放后我国考古工作者进行了重新研究和发掘，过去有人把水洞沟的文化遗物同内蒙古乌审旗大沟湾的文化遗物合称为“河套文化”，重新研究的结果表明这两个地点的文化遗物是不相同的，大沟湾的石器多较细小，并且有柱状石核和细石器，表明它比水洞沟的石器有较多的进步性质。过去把水洞沟的时代说成是旧石器时代中期，重新研究的结果认为它应当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

6. 峙峪遗址

山西朔县的峙峪遗址发现于1963年，材料有人的枕骨一块，石器一万五千多件，装饰品一件和大量动物化石。石器是用脉石英、石英岩和硅质灰岩制成的，体积一般都不太大，主要的类型有小型砍砸器，尖状器和石簇。峙峪文化与大沟湾文化有密切关系。

7. 小南海遗址

河南安阳的小南海遗址发现于1960年，材料包括大量的旧石器和一件装饰品，伴生的动物化石有鬣狗等十八种。小南海石器遥承北京猿人石器而有所发展，从它有类似细石器的细小石器来看，有可能是我国中石器及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先驱，也有可能同峙峪文化、大沟湾文化和下述的富林文化组成一个独立的小石器传统。

8. 富林遗址

四川汉源的富林遗址发现于1960年，1972年进行正式发掘，发现石器四千多件，伴生的哺乳动物化石种类较多，石器较为细小，类型有刮削器、尖状器、端刮器和雕刻器等。

9. 其它晚期智人化石

据报道，在台湾省台南县左镇菜寮溪发现了人头骨片，其年代可能在一万年到三万年之间，这是台湾发现的最早的人类化石。

还有在辽宁建平发现的一段肱骨和山东新泰发现的一个臼齿都属晚期智人。但难于确定是更早些的还是更晚些的时期。

此外，还有1951年在吉林榆树周家油坊发现的两块头骨碎片和一根胫骨（代表榆树人），在江苏泗洪下草湾发现的一段股骨（代表下草湾人），在云南丽江发现的三根股骨（代表丽江人），这些可能是旧石器时代晚期或其后的人骨，它们的确切的地质时代还难于确定。

我国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遗物发现多，分布广。这个时期的智人化石及其文化遗物的发现和研究，对现代人种族起源的探讨，尤其是对黄色人种或蒙古人种起源的探讨，提供了重要的依据，表明了中国的远古居民当时同外界有过接触和文化交流，但是他们及其文化有其自身的继承特征。

* * * *

现在，我想来对比一下古人类学研究在新、旧中国的情况和说明我们取得这些成绩的主要原因和不足之处。

旧中国的古人类学研究，从本世纪二十年代开始，到1949年的二十多年中，经过正式发掘的旧石器时代遗址，只有北京周口店、宁夏水洞沟和内蒙大沟湾等三处。此外只有一些零星发现。而在这三十年中，大大增加了重要地点的发掘，时代从人类的最初出现直到人类文明的晚期，人类发展的主要阶段都有了重要的化石代表和文化遗物。研究人员在全国解放时只有两、三人，现在单是在我们研究所就有三十多人，各地博物馆和大专院校也有部分人员从事这项工作。

在我国，从事古人类学的研究。不只是为了了解人类起源和发展的过程及其规律，并且通过人类起源和发展的科学事实，向工农兵和广大群众宣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新中国成立后，逐渐改变了过去古人类学研究冷冷清清的局面，从事这门科学的人员在全国范围内配合各有关部门，结合农田水利和基本建设工程，进行调查发掘工作。与各

地博物馆紧密合作。全国二十多个省市的博物馆举办了从猿到人的展览。人类起源和发展的知识，得到了空前的普及。广大群众在生产过程中发现了化石和石器，都能及时报告，并对化石地点加以保护。三十年来我们的重要发现绝大部分都是与人民群众的帮助和各级政府部门的大力支持分不开的。

三十年来，我们的古人类学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与人民对我们的期望，还有很大的距离。我们还需要在全国的广大地区内进行调查发掘工作，需要加强系统的综合性的研究，新技术的应用和理论性的研究需要注重。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国的古人类学迅速向前发展，必将为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作出更大的贡献。

PALEOANTHROPOLOGY IN CHINA

(1949—1979)

Wu Ru-kang (Woo Ju-kang)

(*Institute of Vertebrate Paleontology and Paleoanthropology, Academia Sinica*)

(Abstract)

A general review on Chinese paleoanthropological studies in the past 30 years is presented here in the following separate sections:

1. Fossil pongids and early hominids,
2. Human fossils and artifacts in Early Paleolithic Period,
3. Human fossils and artifacts in Middle Paleolithic Period,
4. Human fossils and artifacts in Late Paleolithic Period.

The achievements and development of the research on paleoanthropology in new China are also given as contrasted with those in old China.